

新时期文艺学建设丛书

钱中文
童庆炳 主编

文艺学的民族传统

· 张少康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鄂)新登字 1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艺学的民族传统/张少康著.

-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6

(新时期文艺学建设丛书/钱中文,童庆炳主编.)

ISBN 7-5622-2097-2/I·156

I. 文…

II. 张…

III. 文学理论-研究-文集

IV. I2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1169 号

新时期文艺学建设丛书

文艺学的民族传统

© 张少康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昌桂子山 邮编:430079 电话:027-87676240)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责任编辑:陈昌恒

封面设计:罗明波

责任校对:崔毅然

督 印:朱 虹

开本:850×1169 1/32

印张:9.625 字数:225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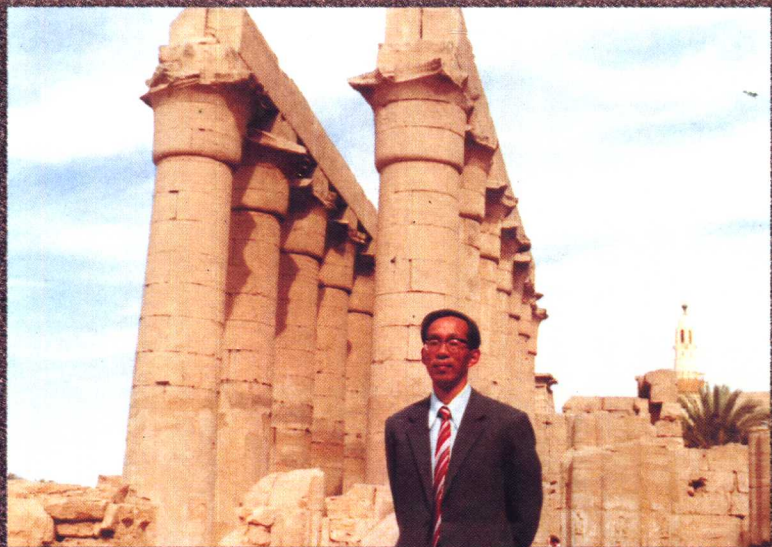
版次:2000 年 6 月第 1 版

200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定价:16.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承印厂调换。



作者近影

总 序

20 世纪的我国文学理论，经历了曲折发展的道路。一般认为，世纪之初几十年与世纪之末的几十年，是我国文学理论发展的较好时光，自然，三四十年代也是出现一些重要的文学理论著作的时期。

世纪之初，我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势头原是很有希望的。梁启超标榜诗界革命、小说革命，把文学与当时救国救民的任务结合起来，也是国情使然。而王国维在 19 世纪德国哲学的影响下，摆脱了我国几千年的政教文学观，主张文艺为人生，提出文学的独立性与自主性问题，这较之稍后的美国与俄国的形式主义者的文学自主性理论，在论说上既早且要深入得多。但是，文学理论发展的趋势，并不是完全以个人的学识、审美趣味为依归的。

自 20 年代开始，随着我国社会斗争的形势的变化，从苏联、日本介绍过来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并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马克思主义文学观使人们了解了文学与社会、文学与生活 and 文学与时代的关系，以及文学具有阶级性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从根本上改造了我国的文学理论，力图使我国的文学理论走上科学化的道路。

50 年代，由于形势、环境的复杂原因，出现了独尊一家、废黜百家的现象，于是随之而来的是文学理论的急剧的政治化倾向、庸俗化倾向，这一过程使文学理论批评成了纯粹的政策、政治功利手段。到 70 年代末，文学理论界几乎是一片荒芜、败落

景象。当然这期间并不是没有精当之论、深微之论，但都被淹没于政治口号之中，更有甚者则遭到无情的批判。

70年代末，我国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一个文化转型期，文学理论终于出现了转机。随后，文学理论界在改革、开放的思想引导下，大规模地介绍了外国文论，引进了百年来的各种西方文艺思想。短短十来年间，人们兴致勃勃地模仿、宣传、实验，几乎把百年来的各种欧美文艺思潮中操演了一遍，文艺思想空前活跃。

在这种外来文艺思想如潮水般涌来的情况下，人们要保持心态的完全平衡是不大可能的，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在思维方式上，都无不受到触动。看到外国文论发展的趋势以及我国文论难以为继的状态，自然会产生求新求变的渴望。这时也有人或把外国文论视为现代文论的范式、我国文论的出路所在；这是因为隔阂既久，所以难免眼花缭乱，心态浮躁，也往往会浅尝辄止，囫囵吞枣；或抱着拒斥的态度，把外国文论视为资产阶级文艺思潮的泛滥，内心惶惶，实有朝不保夕之感，其实这也是大变动时期的正常现象。80年代中期，文学理论界有关文学主体性的争论的出现，是被我国80年代初哲学中的有关人道主义、人性问题、异化问题的讨论所准备了，是为外国文论、外国文学的大量介绍、影响所准备了，更是为我国文学创作中新的突破的酝酿所触动的结果。在文学理论问题的争论之中，可以说各种思想竞相展现，几乎人人都认为真理在自己手里，要找个地方，一吐为快，或登高一呼，竖立新的旗号，文学理论似乎处于严重的失序状态。实际上，这正在逐渐酝酿着一种在失序中不断完善的新型的有序状态，或者说一种新的理论格局。

文学主张杂语化、多样化的时代来到了。一旦旧有的禁锢被捅开，这时就让人觉得，文学理论中的问题是如此众多，以致任何问题都成了问题，必须进行重新阐释；而文学创作中层出不穷

的新问题，也常常使理论与批评无法对创作再发表恳切、精当之论，不能不陷入尴尬境地。一些从事文学理论研究的专业学者，事实上早就思考着、协调着文学创作与理论的关系，希冀建立一种多样化的新的文学理论，这就是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

所谓“中国特色”，一、就是用中国人自己的目光、观点与理解，而非外国人的目光、观点与理解，来阐释中外文学现象。近百年来，中国人几乎总是跟随在外国人的理论创新之后，翻译介绍，来往奔走，疲于奔命，而这种跟随与模仿，又往往变为一种时髦与招摇。二、就是必须连接六七十年来被忽视甚至中断了的古代文学理论传统，从古代文论中吸取丰富的营养，摄取那些具有生命力的观念，激活那些并未死去的东西，使之成为新的文论的血肉。三、要与当代的中外文学实践相结合，用以阐释我国的与外国的新文学现象，形成我国新的文论。四、有着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又是多种多样的，对精神现象的大一统、单一化的理解一旦破除，文学理论就显出其自身的多姿多彩，加上各种学派的理论竞丽争妍，就会显得更加绚丽斑斓。

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建设，正在进行之中。建成这一文学理论的标志是，在吸收中外古今文论的基础之上，我们在阐释本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现象时，在理论上有自己的一套不断确立着的规范、术语与观念系统，具有我们自己的理论独创之处；在世界文论中，不是总是跟着别人说，而是用我们自己的话语表述，并在世界多元化的文论格局中，有着我们文论的一定地位，使中外文论处于真正的交往、对话之中。开始于80年代中期直至今天的文学理论的反思，大体是按照这种认识进行的。

回顾文学理论的进展与更新，我们可以说，这20年的光阴并未虚度浪费。就我们所知，不少学者广泛涉猎中外文学论著，借鉴各种流派研究方法，探讨着文学的不同问题：都曾清理、整合过自己的学术思想，从不同侧面来阐明种种文学现象，以适应

新的文学实践与新的文学潮流的需要。

对于 20 年来的文学理论研究成绩，我们自然不能盲目乐观，但也不宜妄自菲薄。新时期的文学理论是个很有成绩的部门，只是未加集中、未曾展示而已。文学理论中出现了不少好书和优秀著作，这是事实。一是它们具有创新意识。创新意识就是能够抓住理论中的关键问题或是新的问题，从新的角度，对它们进行合乎实际的理论阐述，提出新见解、新观点，使理论问题在原有的基础上，获得新的说明，从而使理论有所丰富、有所发现、有所前进。只有创新，才能使文学理论研究具有活力，获得生命。新时期的文学理论改变了原有的文学理论的面貌，它的理论探索的锋芒射向文学领域的各个方面，它所讨论的不少问题，是过去的文艺学未曾涉及的，因此不时引起思想的火花而新见迭出。自然，作为新的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的整体形态还不够成熟，但是就单本著作水平而言，一些学者是获得了较高的学术成就的。

二是这些著作初步实现了理论观念的多元化。文学本身的问题是可以分为多种层次的，每一层次的问题探讨的角度又是多种多样的。十多年来，有关文学审美、性质、特征、作品、文体、结构、意象、意境、境界、作者、读者、阅读、修辞以及文艺心理学、文学社会学、文学阐释学、接受理论、比较文论与文化诗学等这类问题的探讨，都有专著问世，虽然水平参差不齐，但也不乏精品。

三是研究方法的多样化。文学理论学派进入多元化之后，研究方法自然出现了多样化趋势，而一些学科本身就要求新的方法，如文艺心理学、文学话语研究等，方法的多样化更加促进了理论的多元化。这种景象还是我们在 80 年代初所梦寐以求的。理论的多元化、方法的多样化，可以使理性的智慧获得解放从而排除人类思维的独语现象，可以使学术个性得到尊重，使它们成长，获得生机。多样而巨大的学术个性的出现，是一个时代学术

成就的标志，一个没有学术个性的时代，必然是平庸的时代。有了学术个性的出现，才谈得上学派的形成，进而漫向四面八方，推动学术的更新与发展。可以这样说，今天文艺理论中的学术个性正在探索之中与形成之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大声疾呼文学理论与方法多元化的原因。

一个理论创新的新世纪已经来临。不过任何一种新型的理论形态的建立与发展，都要以前人提供的“思想资料”为基础的。新时期的文论，作为一个良好的开端，它们无疑可以成为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的前期成果；而作为丰富的思想资料，它们无疑将汇入新世纪的新的理论创造之中。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邀请我们编选一套“新时期文艺学建设丛书”，我们十分高兴地接受了这一工作。“丛书”将分辑出版，每辑6种。在目前出版条件相当严峻的形势下，出版社毅然组织这类学术著作的成批出书，这对于已经走过一段时间的新时期的文学理论来说无疑是一个肯定，对于即将来临的新世纪的文学理论建设，更是一种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巨大鼓励；这种气魄与目光，是令我们十分感佩的。

钱中文 童庆炳

1999. 9. 9

自序

我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教学和研究将近 40 年了，这里想谈谈我所走过的学术历程，也算是对自己学术研究的一个回顾和总结吧。

1955 年秋，我从上海中学毕业后考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在大学学习期间曾参加了我们年级（北京大学中文系 1955 级）集体编著《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小说史》的工作，并担任编委。1960 年大学毕业后，系里留我在文艺理论教研室工作，师从当时中文系主任杨晦教授学习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并从事这方面的教学和研究。自 1961 年秋季起，我和邵岳先生一起为本科高年级学生开设《中国古典文论选》，同时以严羽《沧浪诗话》为切入点，以中国古代的诗论为中心，研究中国古代文艺思想史。1962 年 11 月在《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专栏发表第一篇学术论文《试谈〈沧浪诗话〉的成就与局限》，对《沧浪诗话》的理论成就和历史局限作了比较实事求是的分析。1964 年我又在《北京大学学报》发表长篇论文《论〈沧浪诗话〉——兼谈严羽和王士禛在文艺思想上的联系与区别》，在深入探讨严羽《沧浪诗话》在中国文艺思想史上的历史贡献之同时，着重把严羽的诗学理论和他所推崇的盛唐诗歌创作实际结合起来，从分析盛唐诗人名作出发，研究了著名的“盛唐气象”美学内容。这是一篇比较全面地探讨严羽《沧浪诗话》诗学理论体系的文章，也是我研究中国古代文艺思想发展中侧重艺术审美特征一派的开

始,我认为以司空图、严羽、王士禛为代表的这一派的文艺思想最能代表中国的传统审美特色。然而,正当我对古代文学理论的研究开始走向深入的时候,却因为十年“文革”的浩劫而不得不中断了。从1964年的“四清”运动、1966年文革开始,一直到1977年“文革”结束后学校恢复正常秩序,整整14年被迫放弃了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教学与研究。从1971年到1976年,按照当时工、军宣队的要求,我改行为工农兵学员教马列文论,这虽然是不得已的事,但倒也给我以机会认真地阅读了不少马列的原著,并与吕德申教授一起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选注了高校教材《马恩列斯论文艺》一书。在这个过程中,我也阅读了不少西方古典的文艺美学著作,提高了自己的文学理论素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对我后来的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也是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的。从1979年起,北京大学中文系恢复了中国古代文论的教学,我也回到了自己原来的研究岗位,并为1977年开始的“文革”后新入学的历届高年级学生讲授《中国文学批评史》一课。

当我重新进入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领域时,我对自己的研究方向和角度有了新的考虑和想法。我决心从清理中国古代文艺思想发展的源头开始,系统地研究中国古代文艺思想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的不同特点及其规律,从而深入地探讨中国古代的文艺美学传统,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民族特色。我认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发展曾经历了悠久的发展历史,但是最重要的有三个时期:一是先秦,这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萌芽产生期,但它为后来文学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哲学和美学思想基础;二是魏晋南北朝,这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发展成熟期,基本上形成了我国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学理论批评体系,并有了自己的一整套专门名词与术语;三是明清期,这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繁荣鼎盛期,总结了我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发展的历史经验,

并对它作了系统的整理和深入的拓展。因此我必须首先研究先秦时期的文艺思想。经过了一段时间对先秦诸子原著的研究，我感到一直被国内学术界置于否定地位的老庄文艺思想，其实对中国古代审美传统的形成和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比儒家思想有着更大的影响，特别是在文学艺术的创作思想方面，几乎都是在老庄思想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为此，我在1980年所写的《论庄子的文艺思想及其影响》一文，对庄子的文艺思想作了比较全面深入的分析，为老庄文艺思想翻案，给予了很高的肯定评价，这是和解放以来所有对庄子文艺思想评价完全不同的。我认为解放以来之所以对庄子文艺思想持否定态度主要是受“左”的思想影响的结果。这篇文章在《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未定稿》上发表后，受到很多学术界朋友的肯定，其中的一些主要观点，如关于天工自然、有无虚实、虚静物化、言不尽意等，都为后来许多研究庄子文艺思想的论著所接受。那时我还应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要求，接受了编选《先秦两汉文论选》的工作。在阅读和研究先秦两汉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我所着手撰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先秦诸子的文艺观》。虽然这只是一部八万余字的小书，但正像后来它的日文本译者、神户大学教授釜谷武志先生所说，在此前还没有人对先秦诸子的文艺思想作过全面的专题研究。我在本书中对中国古代早期文艺思想的特点和主要派别及其内容作了比较概要的分析，它也确立了我后来研究文学理论批评发展的基本思路：儒家的影响主要是在文艺的外部规律方面，而道家（包括后来的玄学和佛学）的影响则主要是在文艺的内部规律方面。

在“文革”以前，我曾经进行过《文赋集释》的撰写工作，已经准备了大约十多万字的初稿，可惜在“文革”中全部丢失了。在写《先秦诸子的文艺观》的同时，我又重新收集大量有关陆机《文赋》的资料，并在写完《先秦诸子文艺观》后不久，就

完成了《文赋集释》一书。我在这本书中不仅整理收集了自《文赋》产生以来一直到“五四”的所有资料，精选了从“五四”到80年代初期的重要研究成果，按校勘、集注、释义三个方面，逐段逐句对《文赋》进行分析，而且对《文赋》的文学理论内容作了系统的研究，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其中也对钱钟书先生诠释《文赋》中的某些观点提出了不同看法。这本书受到学界好评，李庆甲先生在《〈文赋〉研究综述》一文中说：“新近出版的张少康的《文赋集释》，汇集了前人校注的成果，并致力于《文赋》理论观点的阐发，为现有研读《文赋》最完善的注释本。”（《文史知识》1985年第五期）我的《先秦诸子的文艺观》是对一个特定时期文艺思想的宏观考察，而《文赋集释》则是对一部有代表性的文论专著的微观研究，同时也是专题性的文献资料整理和考证。我认为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研究，应当采取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方法，并且要使理论的研究建立在文献资料的整理考证的基础上，我想这也是一个严谨的学者应有的基本态度。我的研究工作也是一直遵循着这样一个原则进行的。在完成了《文赋集释》后，我结合教学工作继续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但是研究范围扩大了，研究的历史跨度也加大了。我撰写了许多专题研究论文，其中既有宏观的理论问题研究，如《论意境的美学特征》、《神似溯源》、《齐梁风骨论的美学内容》、《也谈古代文学理论中的现实主义问题》、《民本思想和实录精神》等，也有微观的专人专题研究，如《试论墨子的文艺思想》、《论王充的文艺思想》、《汉代对屈原和〈楚辞〉评价的争论》、《应、和、悲、雅、艳——陆机〈文赋〉美学思想琐议》、《〈文心雕龙〉的原道论》、《〈文心雕龙〉的体性论》、《〈文心雕龙〉神思论》、《论钟嵘的文学思想》、《关于韩愈文艺思想的几个问题》、《象外之象，景外之景——论司空图的〈诗品〉》、《王夫之诗歌理论的历史评价》、《叶燮文艺思想的评价问题》等。对一

些重大问题的综合性理论研究和批评家、批评专著的研究，在我的研究中是起着相辅相成的作用的。我一直认为没有对批评家和批评专著个案研究的基础，综合性的理论研究不可能深入；而不作综合性的理论问题研究，也很难提高批评家和批评专著研究的水平。

在撰写上述论文的同时，我先后撰写了两部研究专著：一部是《中国古代文学创作论》，另一部是《文心雕龙新探》。前者是对中国古代文论中有关文学创作理论的综合性理论研究，后者是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中影响最大、最为重要的一部名著的专题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创作论》在1984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我在这部书中第一次比较全面地研究了中国古代文学创作理论的体系，全书分艺术构思、艺术形象、创作方法、艺术表现的辩证法、艺术风格五个部分。在每一部分中，我都力求寻找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特殊规律和具有民族特色的理论范畴、专门术语，并作出全面的系统的理论分析。例如关于“艺术构思”，我论述了虚静、神思、感兴、物化四个专门问题。关于“艺术形象”，我论述了物象和意象的联系与区别，中国古代关于形象塑造的方法：神用象通和拟容取心，艺术形象的隐秀特征和意境的创造。关于“文学的创作方法”，我主要论述了实录写真和奇幻夸诞两方面的问题。关于“艺术表现的辩证法”，我着重分析了十二组对立统一的关系，如形与神、假与真、一与万、虚与实、情与理、理与趣、情与景、意与势、文与质、通与变、风骨与辞采、自然与法度等。关于“艺术风格”，我主要论述了中国古代有关风格形成的主观因素：才、气、学、习，和风格形成的客观因素：世情和体式，风格的基本类型和多样性，风格的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在论述每个理论问题时也考察了其历史演变情况。我在探讨中国古代的文学创作理论时，虽也吸收西方的某些文学理论和文学思想，但主要还是从中国古代文论的实际出发，结合

具体的创作实例进行分析，努力寻找我们东方文艺美学的特殊规律，严格地按照我们自己传统的特色来论述。同时，我在论述古代文学创作理论的时候，没有仅仅局限在文学的范围之内，而是广泛地联系中国古代绘画、书法、音乐等艺术理论批评来加以比较分析。因为中国古代很多文学理论批评术语，在绘画、书法、音乐等艺术理论批评领域中也是通用的，而且很多就是从艺术理论批评中移植过来的，不这样联系起来分析就讲不清楚也无法深入。本书出版后，曾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注意，我曾收到很多不认识的海内外学者和朋友的来信，他们给予了我很多的鼓励。同时，它也受到一些当代作家的重视，他们认为对当代文学的创作也很有参考价值。本来我还计划要写本书的续编，着重讨论中国古代关于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分体的文学创作论，但是由于繁忙的教学工作和许多更为迫切的科研课题需要我去做，所以至今未能如愿，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能对本书作一次全面的修订和补充，同时完成续编的撰写工作。

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一部无与伦比的伟大著作，是东方古代美学和文学理论的最为杰出的经典。我以为作为一个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研究者，如果不对它作深入的研究，那么很难称得上是一个真正合格的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研究者。我的《文心雕龙新探》一书是在为北大中文系高年级学生和研究生讲授《文心雕龙》的基础上撰写的，因此我努力把全面地分析《文心雕龙》的理论内容和自己研究的心得结合起来，以阐述《文心雕龙》文学理论体系为中心，着重于探索《文心雕龙》文学理论的历史渊源。王运熙先生为本书所写的序言中曾对本书的内容和特点作了如下概括，我以为是比较符合我写作时的意图的。他说：“本书对刘勰的身世和《文心雕龙》的理论作了新的探索。他对全书的理论体系和内容作了详细的论述，提出了不少新的看法，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有的看法相当精警而

富有启发性。对刘勰的身世，虽着墨不多，也能独抒己见。本书对刘勰理论历史渊源的探讨，尤为重视。他在这方面搜集了许多资料，除刘勰以前的文学理论外，广泛涉及到哲学、历史、艺术、宗教各个方面，并与刘勰的理论联系起来，细致地剖析其源流关系。关于刘勰理论的历史渊源，过去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和研究《文心雕龙》的著作、论文中，也有所涉及，但比较简单粗略，本书在这方面当做一个重点来研究，作了较多的发掘和开拓，提出了不少可贵的见解，因此显得特别富有新意和特色。”本书于1987年在山东齐鲁书社出版后，也得到很多海内外同行的鼓励和肯定，特别是台湾大学中文系蔡璧名小姐非常热心，在1989年夏天将本书和《中国古代文学创作论》一起带到台湾，推荐给文史哲出版社，并得到台湾师范大学著名的《文心雕龙》研究专家王更生教授的支持，两书均有幸在台湾出版繁体字本。蔡璧名小姐还在百忙中为拙著校对。我也借此结识了很多台湾的同行朋友，这是我感到非常高兴的事。

为了全面而深入地研究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的历史，我在完成上述两书后又做了两件工作：一是在我系青年教师卢永璘先生的协作、帮助下，共同完成了《先秦两汉文论选》的编选工作，二是编辑了我已发表的学术论文选集《古典文艺美学论稿》。《先秦两汉文论选》本是应人民文学出版社之约而编选的，我们不想把它编成一本一般的断代文论选集，而是在阅读了几乎所有先秦两汉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经过认真研究而选录的一部比较完整的文论资料集。由于先秦两汉时代人们对文学的认识有一个从文史哲不分到文学逐渐独立的发展过程，因此我们的选录范围是比较宽的。文学和艺术，尤其是诗和乐在早期也是不分的，所以我们也选录了与诗相通的乐论内容。同时特别注意这一时期有关美学思想方面的资料。《古典文艺美学论稿》收集了我在80年代所写的一些有代表性的学术论文共30篇，其中前8篇是有关中

国文学理论批评中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后 22 篇则是我对自先秦至“五四”各个时期有代表性的文学理论批评家的专题研究文章，如庄子、墨子、王充、陆机、刘勰、钟嵘、韩愈、司空图、苏轼、严羽、王夫之、叶燮、石涛、郑板桥、王国维等。为什么取名“古典文艺美学”呢？主要是考虑我这些文章论述的范围实际上已经超出了文学理论批评，其中也包括了很多美学和艺术理论批评的内容，如有关意境、风骨等的美学内容以及石涛、郑板桥的绘画美学思想等。诚如我所特别敬重的陈贻焮教授为本书所写的序中所说：“这部书虽是论文集，由于选题和编次得当，尤其是论述时注意宏观与微观、时代与个人、理论与资料、纵探源流与横铨众说等等的有机结合，却能在有限的篇章中多侧面多层次地勾勒出我国古代文艺理论发展史轮廓来。”它为我进一步写作文学理论批评史和文艺思想史作了准备。

正是在上述基础上，我在 1990 年至 1995 年间写作了《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上下卷，并分别于 1995 年与 1996 年出版，共计约 75 万字。本书是我在日本九州大学文学部任客座教授时开始写作的，并邀请我的好友、福岡大学教授刘三富先生参加，由于刘三富先生很忙，只参加了个别章节初稿的写作，基本上由我完成。在这本书中我在对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的历史分期和基本规律上提出了和已经出版的一些文学批评史不完全相同的看法，也就是说在理论体系上是有自己的特点的。首先，是注重理论分析，对中国古代的许多特殊的理论命题和理论概念，进行较为深入具体的阐释，力求以通俗的语言把他们讲清楚。其次，在内容的取舍方面，我着重讲纯文学的理论批评。我认为对中国古代的杂文学观念应当作科学的历史分析，不能不管历史发展而全盘加以肯定，有很多属于一般文章写作的问题，亦即文章学的问题，不应放在文学理论批评中来论述。第三，在有关文学理论批评的论述中我比较重视审美方面的内容，亦即更注意中国古代

对文学的内部规律的探讨。我认为这一部分内容比有关文学外部规律的探讨，对我们今天来说其现实意义要更大，更能体现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民族传统特色。第四，我在写作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时，强调了以下三方面的内容：一是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和整个中国历史文化背景、特别是哲学政治思想的关系；二是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和各种艺术理论批评发展的关系；三是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和文学创作发展的关系。第五，我在论述各个时期重要的文学理论批评家和文学理论批评专著时，特别注意研究他们的文学思想和理论批评的历史渊源以及对后来文学理论批评的影响，着重说明他们具有创造性的新贡献，而不是平面地铺叙他们的有关论述。尤其是在宋元明清时代，文学理论批评家和文学理论批评著作都很多，我只选择其中有特殊贡献和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人物与专著作比较深入具体的分析，而不是罗列很多人作繁琐的叙述。因此本书出版后得到很多海内外同行的肯定和鼓励，也受到不少非专业的读者的欢迎。不少海内外的大学用作教材和参考书，在两年多的时间内已重印了三次。最近我又根据出版社的要求，在原书基础上压缩修订改写并增加了原来没有写的近代部分，完成了一本将近40万字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教程》，作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对海内外发行的系列教材之一。此书已经在1999年春出版。同时，我还选择了自1988年至1998年间的20篇有代表性的学术论文，编辑了《夕秀集》，取陆机《文赋》“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之意。本书由华文出版社于1999年初出版。

在回顾我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经历时，我感觉这是一个十分艰难，然而也是十分愉快的过程。中国古代文论实在是一块难啃的骨头，它和许多学科都有着密切的联系。要弄懂它，必须涉及中国古代的政治、哲学、历史、艺术、宗教等很多方面，同时又要非常熟悉中国古代的文学创作，也需要有相当的理